

1918年夏天。日本福冈的博多湾海岸。习习海风中,已经三年没回过祖国的郭沫若一边听着张资平介绍国内文学界的情况,一边忍不住叹着气,“唉!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仁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那么,人呢?曾在预科同班的郁达夫,东大造兵科的成仿吾……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同仁的还是只有四个人,“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仁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报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便可以印制吗?”(见郭沫若《创造十年》)主张有了,张资平也赞成,接下来该去征求成仿吾与郁达夫的意见——这就是郭沫若所谓的创造社及其《创造》的“受胎期”,是一个将在中国现代文坛上高扬浪漫主义旗帜的文学社团及其刊物的生命之始。

然而,“十月怀胎”期满,渴盼已久的宁馨儿却不曾如期降生。大家都着急,最沉不住气的是成仿吾。在他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迫不及待的情绪溢于言表:“新文学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流勇退,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终于,天边出现了曙光。1921年2月,成仿吾得到消息:上海泰东图书局改组编辑所,要分成法学、文学、哲学三科,有人推荐成仿吾任文学科主任。好事啊!成仿吾感到梦想与现实只差一步之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牢牢抓住这上天的赐予!于是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学位,提前离校回国。郭沫若也立刻休了学,二人携手齐步登上了轮船。看着船头犁开万顷海水一路向前,他们“那时候委实感受着‘新生’的感觉,眼前的一切物象都好像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所以不得不经受一次好事多磨的失望:当他们兴冲冲抵达上海时,那原本以为非成仿吾莫属的“文学科主任”交椅上已经坐上了别人。好在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是一个“充满着亢爽豪侠的燕赵之士”,那时虽然“正在穷困挣扎之中,深深地感到自己精力的衰弱,和书店经营的不得其法”(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但还是勉力接纳了他们,只是既没有发聘书,更没有发薪水。是因为安排两个人有困难吗?成仿吾想。于是主动离去,跑到长沙找了份工作糊口,把郭沫若一个人留在泰东伺机商谈创办文学杂志的事情。工作自然不会轻松,收获倒是颇为丰盈——赵南公到底接受了郭沫若的主张,答应出版纯文艺性的同仁杂志。

1921年9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第一版上,赫然登出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预告末尾附列出了“创造社同仁”名单: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一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文学社团,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诞生了。多年过去之后,在《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的《编辑余谈》中,郭沫若对它做了这样的介绍:“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同时,郭沫若告诉那些愿意加入创造社的朋友:“只要是赞成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优秀的作品”便是“越过

“创造社”与《创造》

□张丹

时空之限的黄金翅膀”,便是与创造社“一块儿翱翔”的资格(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1922年3月15日,《创造》问世,因为担心稿件和编辑力量的不足而“暂出季刊”,约定待“将来能力充足时再用别的形式”。季刊共出6期,至1924年2月28日终刊。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轮流编辑。泰东图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该刊以创作为主,兼顾评论和译文,有创作、评论、杂录三大栏目。创刊号上登载的作品都是绝对重量级的,如郭沫若的诗歌《创造者》,戏剧《棠棣之花》第二幕,论文《〈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张资平的小说《她憧憬着祖国的天野》《上帝的儿女们》《写给谁的信》,评论《出版的道德》《创作》;田汉的戏剧《咖啡店之一夜》;郁达夫的小说《茫茫夜》,译文《维尔特杜鹃歌来序文》,论文《文艺私见》;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的新年》,《诗十六首》等等。

社团成立了,刊物也出版了,想做的似乎都做了,但郭沫若们的心绪却并不轻松,仿佛是交出了一份毫无把握的试卷,紧张而忐忑地等待着社会来宣布成绩的优劣。大约是《创造》出世两个多月后的一个夜晚,郭沫若和郁达夫小心翼翼地向赵南公打探杂志销路,得到的回答是“出版两千部,还剩下有五百部的光景”。一句话如同迎面泼来的一盆冷水,让两个人都立刻感到了无人同情的悲哀。于是郁达夫喊起来:“沫若,我们去喝酒!”“好,我们去喝酒。”两个人挽着手走出店门,就在四马路上一连吃了三家酒店。最后一家是在青莲阁,两人直喝到酒壶摆满了一方桌,顺次移到邻接的空桌上去,终于把邻桌也摆满了。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酒楼,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郭沫若望月兴叹高声叫嚷:“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在那电光辉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他两个孤男另女的人一样。”

那是一段最难挨的日子,所幸终于过去了。《创造》季刊以其文艺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译介上的成就,不久即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文学青年。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日益强健着创造社的肌体鲜活着它的生命,使它日益壮大着自己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从而得以与文学研究会并驾齐驱。到第二年,郭沫若结束了留学生活,郁达夫也离开了在安庆政治学院的教职,两个人先后抵达上海与成仿吾汇合,编辑力量顿时雄厚起来。三股绳拧成一股劲,创造社的前期活动由此进入了最活跃、最兴盛时期。撰稿人明显增多,除原有主力外,又添进了郑伯奇、田汉、陶晶孙、王怡庵、洪为法、邓均吾、何畏、渝女士、王独清、闻一多、梁实秋、冯至、徐志摩等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文稿大量积存,季刊过长的出版周期已经成为它自身发展的桎梏。于是“季刊”换周报,运行速度大幅度提高。

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创刊。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等轮流编辑。泰东图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创刊号上刊登的《创世工程之第七日》,可以看作该刊的宣言:“上帝,你最初

的创造者哟!……古代的诗人说:你创造世界的工程只费了七天的劳力。/……上帝,你如果真是这样把世界创出了时, /至少你创造我们人类未免太粗滥了罢?/你最后的制作,也就是你最劣等的制作/无穷永劫只好与昆虫兽同科。/人类的自私,自相厮杀,冥顽,偷情/都是你粗滥贪懒的结果。/你在第七天上为甚便那么早早收工, /不把你最后的草稿重加一番精造呢?/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 /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上做起。”

与《创造》(季刊)相比,《创造周报》除去缩短了出版周期之外,内容上的区别也十分明显:前者以创作为主,评论、介绍为辅;后者则反其道而行,把力量主要用在了翻译与批评上。文学批评方面主要有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闻一多关于《女神》的评论文章等。翻译方面有郭沫若所译尼采《查拉图斯拉的长篇连载以及成仿吾、敬隐渔、张闻天等人的译作。

周刊出世刚满两个月,日刊就接踵而来。1923年7月21日,《创造日》创刊。该刊为《中华新报》文艺副刊,由中华新报社发行。成仿吾、郁达夫、邓均吾编辑。主要发表创作,兼顾评论和翻译。创作方面以新诗和小说为主,散文、随感等作品次之。主要撰稿人有郭沫若、倪贻德、周全平、敬隐渔、张友鸾、洪为法、张资平、王珏、陈醉云、卢冀野、楼建南等。该刊宗旨一如其“宣言”,激情勃发慷慨豪迈:“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和世界万物,都是由无而有,由黑暗而光明,渐渐的被创造者创造出来的。我们不信受天惠特厚,人多众多的中华民族里,就不会现出光明之路来。……现在我们的创造工程开始了。……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我们这一栏是世界人类共有的天国,无论何人,只须有真诚的精神和美善的心意,都可以自由来开垦。……朋友们哟,来!来!我们每日地开荒播种。”此刊匆匆来去,出满101期后于同年11月2日戛然而止。

如上所述,新生的“创造社”一社三园地,忙得不亦乐乎也红火得不亦乐乎。其间虽然田汉等人由于种种原因先后离开了,而队伍的迅速壮大却成为一种趋势。冯至、张闻天、刘海粟、楼适夷、冯沅君……但无论怎样的发展,“创造社毕竟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沫若对于创造社的功绩,不止是起草社章,号召同志,交涉杂志丛书的出版而已;充利刊物,处理人事,以至对于外来攻势的防御,这一切都有赖于沫若的苦心和努力。”(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同为创始人,郁达夫为数甚多的小说和成仿吾犀利的文学批评则合力支撑着创造社最初的刊物。所以,对于创造社来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三个人就像一尊圆鼎的三只脚,缺一不可。他们三个人,在浪漫主义的共性之下又有着各自的个

性:“郭沫若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最深,但他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又显得是接受了雪莱、惠特曼、泰戈尔的影响,而新罗曼派和表现派更助长了他的这种倾向。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浪漫情怀的心,他在重压的呻吟之下寄寓着反抗。成仿吾又不同。他虽然也同样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可是在理论上,他又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张;在作品实践上,他又感受着象征派、新罗曼派的魅惑。他提倡士气,他主张刚健的文学,而他却写出了一些幽婉的诗。”(见于达人、王君《成仿吾传》)

自然形成的核心,自然地发挥着决定性影响。郭、成、郁三人的政治立场、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创造社的性质、特点和命运。他们各自操纵着各自手中的一支笔,一起在创造社的旗帜上画上了三点标记:一是建设新文学的使命感;二是创作方法上的积极浪漫主义;三是把自然科学运用于文艺“创造”中。这样做,并不是“硬要标新立异”,“故意和国内其他文学团体闹对立,而是这些作家的生活、学习环境造成的”(见郑伯奇《亿创造社》)。因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们不是学医的便是工人的,或者学经济学法律,但他们又都自幼爱好文学,留日期间又都从不同渠道汲取了异地的精神食粮,从而增加了知识,扩大了眼界,激起了创作欲望。不同的文学背景决定着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所以他们没有接受文学研究会的盛情相邀,而是异军突起高扬起了另外一面旗帜。

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统治着一切。“三套车”奋力驰骋了一阵子之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感到了力不从心的倦怠——不仅是精力,更是财力。于是借着郁达夫接受北大聘书的机会,先把由三人合编的《创造日》停了刊,再用“缓兵之计”把成仿吾“承包”的《创造季刊》拖没了影儿。只剩下《创造周报》了,主编者郭沫若提意将其转至北京交给郁达夫,未果,便转给成仿吾,之后离开上海去了日本。成仿吾自知独力难成事,便在《创造周刊》第52号上发表了《一年的回顾》向读者告别:“……我们决不是卑怯的逃避者,我们也决不愿意放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学革命,和我们的政治革命一般,须重新再来一次。我们休息一时,当是一种准备的作用。不等到来年,秋风起时也许就是我们卷土重来的军歌高唱的时候。亲爱的朋友哟,请等待着,等待我们卷土重来的雄壮的鼙鼓!”

他们的承诺是算数的。一年多后,他们果真东山再起,于1925年9月16日创刊《洪水》并发表《复活宣言》,又于1926年3月16日创刊《创造月刊》。《卷头语》上,他们宣布:“现在我们所以敢卷土重来,再把《创造》重兴,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招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天下的社会的组成。”该刊由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等轮流主编。虽然城头不曾“易帜”,但与事业初创时相比,此《创造》亦非彼《创造》了。

挖掘与勘探 内面世界的尝试

——重读郁达夫的小说《沉沦》

□刘志荣

作为“五四”新文学中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创造社一开始,就以声势凌厉的对文学研究会的攻击和骂战登上文坛。这种借由“攻击”吸引眼球的方式,在之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后继有人,络绎不绝。此种方式的功过是非,时至今日,平心静气的史家已可了然于心,而其创作成就,终究也不可因此种粗鄙浮躁的行为方式所抹杀。

从历史的角度看,创造社对于新文学创作贡献最大者,可说有三:一是郭沫若狂飙突进的浪漫诗歌,一是郁达夫等开创的“自我抒情小说”,一是后期创造社三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实验性的象征主义诗歌。这三方面,研究、论述者都很多,而对郁达夫等人开创的小说流派,则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如果从过去流行的看法稍微深入一步,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就,不仅在于泛泛而论的“人的发现”,更是意发现、勘探与表现人的“内面世界”(这一内面世界,在当时作家笔下,又经常与外界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在这一点上,郁达夫等人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试以郁氏最富盛名的名作《沉沦》分析,它不同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尖锐的象征性叙述来表现自我与外界的截然对立,而更企图勘探内面的私密世界,并由此呈现自我在世界中的某种紧张不适感。

作为“自我抒情小说”的开创者,郁达夫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不管叫什么名字,甚至是历史上的名字,“差不多都有作家自己或者作者的影子在里头”,联接起来“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部长篇来读”。(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2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一点上,《沉沦》也不例外,如果把这篇小说与郁达夫未完成的“自传”,尤其是其中的《雪夜》一章做比较,即不难明白其传记性的“本事”依据——从这一点深入进去进行“文史互证”的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课题,不过限于篇幅,这得是另一篇文章处理的材料,作为从形式结构的角度入手对这篇小说的重读,本文仅需指出:自传与小说到底是两回事,从自传性材料转换为小说,其中需要特定的形式转换,从而使得散乱而平铺直叙的材料,转换为特定的有机结构,否则,在自传性文本中可能感人至深的倾诉式叙述,在小说文本中反而可能会显得没有着落。

《沉沦》的叙述一开始,主人公便处在“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他与世人中间似乎存在着一道“屏障”,而且这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在下文,叙述者告诉我们,这道屏障之所以形成,大半的原因,来自于他自身相反相成的两种病症——“夸妄想狂”(megalomania)和“忧郁症”(hypochondria)。这两种病症,都可以看作人在青春期对外界不适应的症状,前者导致了他自以为是“高人”、“隐士”的自大,后者又导致他自觉连凡人都不如的自卑,而通读全篇,主宰主人公心理

和行为的,无疑是后一种病症。李欧梵曾认为,与郭沫若所代表的叛逆、反抗、英雄式的“普罗米修斯型”浪漫主义者相比,郁达夫可说是消极感伤的“维特型”的代表,《沉沦》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正好符合这一类型人物的特质——“多情和神经质”、“忧郁成疾和宿命论者”。(参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第13、14章,据收入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中的译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不过,敏感、忧郁、夸大的浪漫文人所在多有,在当时中国,郁达夫比较出位的地方,在于他还表现了人的欲望,直接说,就是“性的苦闷”,这一点,把《沉沦》中的“他”和一般的呼唤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的维特型浪漫主义人物区别开来。而《沉沦》中的“性”,也不像文艺复兴时期卜迦丘等的创作那样作为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肯定和对教会束缚的反抗那样来得坦荡,小说里主人公对“性”的态度,颇有些畏首畏尾。从小说里来看,这种猥亵一方面因为世代相沿的习见或医学陈说,另一方面,也因为道德观念的制约——他的“不洁”、“恐惧”乃至“犯罪”感,心理方面纠缠的原因,远大于生理方面。

小说挖掘私密领域,单独来说,并不见得有多少文学意义,只是在郁达夫的《沉沦》里,性成了一

会的不公和他人的敌意……所有这一切不适感,在小说进展的过程中都渐渐纠结到青春期的抑郁与性的苦闷这一点上来——也许正是因为性的吸引力与主人公性观念之间强烈的撕扯,最可以代表一个敏感而软弱的青年,在一个新异的世界里毫无指导地胡乱摸索所造成那种强烈的紧张和不适感——而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缠绕到性的纠结中去的所有紧张不适感,最后又因为性的触媒舒展发散出来,成为滔滔不绝的议论,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郁达夫在小说集《沉沦》“自序”中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述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强烈的吸引力与主人公性观念之间强烈的撕扯,最可以代表一个敏感而软弱的青年,在一个新异的世界里毫无指导地胡乱摸索所造成那种强烈的紧张和不适感——而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缠绕到性的纠结中去的所有紧张不适感,最后又因为性的触媒舒展发散出来,成为滔滔不绝的议论,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沉沦》里,这种面对外部世界的无力感,和同样巨大弥漫的青春期的苦闷纠缠起来,其纠结不清、难以自解,陷于软弱与毫无节制的伤感,也正是理之必然。主人公最后不能不自杀,从小说发展的逻辑看,在小说中也是不得不的结局——而它在当时能感动万千青年的心,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只是表现复杂的心理纠结,郁达夫的那种不加拣择、一泻无余的叙述,并非最合适的方法。郁达夫自言,他的写作,只是想“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他述实在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的词句的,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250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这固然可以说是灵机焕发,却也未始不是缺乏“叙述的自觉”的表现。《沉沦》结尾的“国族论述”,之所以读来觉得突兀,一方面与事先蓄势不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叙述者的介入程度有关。蓄势不够的原因,郁达夫曾作过部分说明:“这两篇文章里,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

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沉沦·自序》)不过这一顾虑,却使得小说的许多重要叙述线索失去着落,本来,在导致主人公忧郁症的内心纠结中,弱国子民的自卑感,社会的不公和他人的敌意,从小说本文来看,描述得就太轻描淡写,而叙述者更指出,主人公所觉得的“歧视”和“敌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自己过度敏感的疑心,这使得这一叙述脉络几乎沦为滑稽。从叙述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如纯粹从主人公的内在视角来详细展开,效果会最为强烈——此可比较于《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小说,而现在的文本,旁观的接近全知的叙述者,时不时会突然跳出来插叙原因,分析主人公“他”的内心,但叙述得既不够翔实,分析得又不够复杂深

刻,导致小说在抒情、叙述和分析之间摇摆不定,最后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够充分和有说服力。郁达夫后来改弦易辙,常用第一人称叙述,开创自我抒情小说,在文学史上也以这一方面影响最大,良有以也。

从文学史来看,郁达夫挖掘内面世界一直进入到私密领域,由此出发来表现自我与世界的分裂和对立,并追究其中的纠缠,在中国新文学中可谓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路,由此以往被视为无意义的或理当压制的黑暗领域进入文学领域,并与一些宏大或“高尚”的话题发生种种纠葛,其后在文学史上产生的种种变化,则更是超出了最初《沉沦》式的朴陋尝试——不过,倘限在中文学领域追根溯源,郁达夫率先实践,可说足功不可没。

丛刊2013年第3期目录

文献史料研究

- 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 吴兴华著、陈越译
- 吴兴华毕业论文的诗学旨趣 陈越
- 新发现《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 沈卫威
- 粉饰逆向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

——从王森然的《周作人先生评传》说起 张先飞

林庚《新文学略说》校读 郭国昌

冒名张恨水的小说伪作考略 谢家顺、宋海东

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

——纪念邵荃麟及“大连会议”五十周年 小 鹰

左翼文学研究